

一、中共政治局常委近期至各地調研活動觀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蔡中民副研究員兼副主任主稿

- 7 名常委分赴各地及機關部門調研，考察主題均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活動情況，突顯意識形態重要性。
- 習近平在內蒙古強調民族團結；李克強著重自由貿易試驗區；栗戰書考察省人大工作；趙樂際巡視地方紀監委運作；汪洋瞭解民族宗教工作；韓正與王滬寧主持中央機關座談會。
- 在中美貿易戰膠著及香港情勢趨緊之際，常委調研聚焦黨建工作及鞏固意識形態，突顯黨內危機仍未緩解。

近期中國大陸在面臨與美國之間貿易談判停滯的困境下，內部還有香港問題及經濟緩步下行的壓力，即便如此，政治局常委們在過去兩週紛紛到地方與機關部門考察與調研，主題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教育活動情況，突顯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一)調研活動概況

按時序來看，習近平首先於 7 月 15 至 16 日到內蒙古，李克強在 7 月 22 至 23 日到上海、栗戰書於 7 月 23 至 25 日到湖南、趙樂際於 7 月 22 至 24 日到寧夏、韓正在 7 月 26 日到發改委，王滬寧則是於 7 月 27 日到中華全國總工會，每個政治局常委在調研期間都了解有關「不忘初心」的主題教育。汪洋則是以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身分於 7 月 14 至 16 日前往新疆和田出席第七次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之後轉往青海調研，並於 7 月 19 日召開全國政協全會時，要求展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根據往例，中國大陸現任與前任領導人每年夏天會聚集在北戴河商討國是，雖然並非正式會議，卻也行之有年（自 1954 年以來，中共中央決定夏季在北戴河辦公，期間受文化大革命影響以致 1966 年至 1983 年暫停，以及胡錦濤於 2003 年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廢除該制度，至習近平任總書記時期才恢復）。在北戴河辦公期間，中共領導人會討論重要議題並進行決策。是故，在前往北戴河前，

政治局常委們大多會輪流出外調研，考察國情，惟此舉實際上並未形成固定制度。因此，7月份的政治局常委外出調研活動可視為北戴河會議的準備工作，透過走訪地方與機關部門，考察國內情勢，以便進行深入討論。

(二) 習近平赴內蒙古調研

就調研內容來看，習近平自「十八大」以來已是第三次到內蒙古（前兩次分別為2014年1月考察基層、2017年7月到朱日和訓練基地閱兵），與其他地區相較，並不多見，但內蒙古是習近平的全國人大代表選區，且去年全國「兩會」時內蒙古人大代表當面邀訪時，習近平已表示「肯定有機會」。此次調研活動是自6月啟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整風運動以來，習近平首次地方考察（習近平於5月31日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進行講話，不但重提「延安整風」，亦稱中共黨內「思想、政治、組織、作風不純」尚未根本解決；此動員會議確定了整個活動的進行方式與目的），並在活動中強調要注意抓「四個到位」（思想認識到位、檢視問題到位、整改落實到位、組織領導到位），重複說明「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與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重要性（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專門至內蒙古自治區自然資源廳指導開展主題教育，此部門乃2018年機構改革後，中央成立自然資源部，地方則相應成立自然資源廳，習近平至該地調研也顯示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

這場運動在黨內自上而下展開，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在此之前，中共已陸續開展三場活動（2014年1月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2015年4月的「三嚴三實」活動、2016年2月的「兩學一做」活動），而習近平也在2013年9月親赴河北省主持「民主生活會」，對照此次內蒙古調研活動極為類似。就隨行的高層領導人來看，丁薛祥、劉鶴與何立峰皆是習近平國內考察行程的必然成員，著重地方經濟發展；因活動中安排接見內蒙古部隊軍官，因此亦有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的加入；關鍵人物還是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其身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一職，自然必須出席習近平的調研活動。陳希曾

於6月時在北京主導召開過「中央指導組培訓會議」和「部分省區市工作座談會」，對「中央指導組」進行思想動員和業務培訓，負責部署整風運動的具體推進工作。除了黨建工作外，考察內蒙古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強調民族團結，顯現習近平對少數民族的重視，希冀能消弭民族分化與矛盾。

(三)李克強等常委調研情形

除習近平以外，李克強在上海的考察是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主，重點在於政務服務，強調簡政放權與提升民眾滿意度，對象為政府工作人員。栗戰書在湖南考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舊址、株洲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湖南省委及省人大等機關。趙樂際到寧夏銀川市的基層社區及國家能源集團寧夏煤業公司與黨員及民眾座談，也實地了解石嘴山市紀委監察委的運作狀況。韓正與王滬寧則是至中央機關調研，前者到發改委主持召開座談會，後者則前往中華全國總工會與幹部職工座談。總地說來，這些政治局常委們調研時的重點仍在於不斷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重要性，並結合各訪視單位的特性與工作性質，要求幹部需貫徹執行。

就政治局常委們的基層考察行程而言，一般是3至5天，地點如在北京或周邊省市則是1至2天；時間段的話，一年常規來說約兩次，年初的春節前後及7月份，但亦有例外，例如2018年下半年，包含習近平在內的多位政治局常委就頻繁外出調研，聚焦經濟問題，涵蓋產業發展、扶貧工作與科技創新等，應是為回應美中貿易戰持續升級的壓力。政治局常委考察地點原則上與其分管工作密切相關，有時也取決於時機，他們會利用出席重要會議及活動之際，在該省市進行考察。類似此次主題統一的常委調研並不常見，前次是2013年7月時，7位政治局常委分赴各地以「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主題進行考察。大部分的調研活動主題相當多元，有經濟運行及增長，國企改革，新農村建設等，而貫徹落實中央重大會議精神、五年規劃執行等主題頻率最高。

(四)結語

在當前美中貿易戰呈現膠著，而香港情勢日趨緊張之際，政治局常委們近期的調研活動卻聚焦在黨建工作及鞏固意識形態上，顯示攘外必先安內的重要性。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亦與習近平於 2012 年底接任中共總書記以來持續矯正黨內不良風氣的目的相互呼應。在 6 月 24 日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中，習近平指出黨內各種「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與「四種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依然複雜嚴峻，惟有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與支持。只是習近平執政至今已近 7 年，黨內危機似乎仍未緩解，更有漸趨嚴重之態勢，反映出過往的黨建工作效果有限。即便是一連串密集調研後，在當前治理架構不變的情況下，單純透過強化意識形態的作為恐怕無法妥善回應當前局勢，遑論調研活動無法涵蓋所有省市與機關單位。在體認到黨內存在迫切危機的情況下，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之重要性不言可喻，惟能否達致共識並研擬出有效的政策方向，仍待時間證明。

二、中國大陸上半年物價變動情形及影響觀察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李志強主稿

- 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呈逐月上升趨勢，主要為豬肉和鮮果等食品價格漲幅所致。
- 預測下半年在氣候、災害等負面因素遞減及增值稅減稅效應下，CPI 漲幅將漸趨緩；下半年人民幣貶值空間及降準規模將有所限縮。

中國大陸統計局在 7 月 10 日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物價變動數據，1 至 6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和去年同期相比(同比)上漲 2.2%。從動態上來看，除 2 月受到去年基數較高效應所影響，CPI 漲幅為半年新低以外，自 3 月開始 CPI 漲幅就從 2.3%逐月上升，至 5、6 月達到 2.7%(見表 1)，創 15 個月以來新高。

(一)CPI 上升主要由豬肉和鮮果漲價帶動

豬肉和鮮果是這一波 CPI 上漲的主要推手，上半年豬肉和鮮果價格分別上升 7.7%和 16.1%。1 至 2 月豬肉價格同比還在下降階段，但到 3 月，豬肉價格轉為上升，擺脫兩年來持續下跌的局面，進入第二季漲幅一路走高。3 至 6 月豬肉價格分別同比上升 5.1%、14.4%、18.2%和 21.1%。豬肉價格的上漲主要和中國大陸豬瘟疫情有關，豬肉供給下降在第二季開始顯現。根據中國大陸農業農村部統計，自去(2018)年 8 月至今(2019)年 7 月 3 日共發生 143 起豬瘟疫情，累計撲殺生豬 116 萬頭。但根據美國農業部 4 月的估算，非洲豬瘟將導致今年中國大陸豬隻減少 1.34 億頭，相當於目前豬隻數量的 30%，由於生豬產能的恢復需要一段時間，供給大量減少將造成下半年豬肉價格可能再漲七成以上。

相比之下，鮮果的價格漲幅更高於豬肉，特別在第二季呈現快速上漲的態勢。6 月鮮果價格上漲 42.7%，漲幅比 5 月擴大 16.0 個百分點，其中鴨梨、富士蘋果、巨峰葡萄、香蕉、鳳梨和西瓜六種水果的

批發均價同比上升 51.7%，6 月底巨峰葡萄、富士蘋果和鴨梨分別較今年首周上漲 55%、80%和 129%。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指出，鮮果價格的飆漲過快，是受到去年主要產區出現凍害天氣，蘋果和梨子的產量分別減少 25%及 20%，由於庫存量不足，加上今年南方陰雨天氣較多，使鮮果生產下跌所致，由於近期開始進入夏季，水果需求逐漸上升，在供給和需求此消彼長之下就推升了鮮果價格的上揚。

(二)CPI 漲幅將趨緩

雖然 5、6 月 CPI 同比增幅較大，但還是在 3%的警戒範圍內，且整體來看大陸的通貨膨脹壓力不大。一是非食物的價格漲幅其實很小，這波不是普遍性的物價上漲。上半年食品價格對 CPI 的拉動比以往兩年要強，在 6 月 CPI 的漲幅中，食品價格年增 8.3%，非食品價格年增只有 1.4%，創下 2016 年 9 月以來的新低，其中豬肉及鮮果漲幅分別帶動 CPI 上漲 0.45 和 0.71 個百分點。如果剔除兩者的影響，6 月 CPI 只有上升 1.54%，另外蔬菜價格升幅在 6 月底有所回落，使當月 CPI 漲幅沒有繼續擴大。隨著 8 月以後氣溫回升，災害等負面因素衝擊遞減，加上夏季為水果生產旺季，預計鮮果價格漲幅在第三季會逐漸下降。下半年豬肉價格雖然仍可能大漲，但豬肉占 CPI 權重約只有 10%，對物價的推升作用將有限，加上增值稅的減稅效應在下半年發酵，在一定程度上可紓解豬肉價格上漲對 CPI 的拉動作用。由於去年第三季基數較高，預料下季 CPI 走勢趨於回跌，第四季則呈現穩定狀態，因此第二季的 CPI 漲幅應該是今年高點，據國家發改委近期的預測，全年 CPI 漲幅為 2.4%，比 2018 年增加 0.3 個百分點。

二是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PPI)去年漲幅高達 3.5%，但今年上半年只有 0.3%，且由 4 月上升 0.9%降至 6 月的零增幅，走勢和 CPI 背道而馳，為自 2016 年 8 月以來最疲弱的 PPI 數據。兩者走勢的分歧，主要是食品價格拉高了 CPI 所致，而 PPI 則和 CPI 中的非食品商品關連性較高。從動態來看，PPI 在上半年呈現波動走勢，3 月受基本建設、房地產、製造業等投資升溫，工業品價格開始出現上漲，但這種回升趨勢從 5 月就停頓再轉為下滑，顯示市場需求陷入停滯，主要是受到美中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因素以及大陸內部景氣下滑的

影響。7月15日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二季的GDP成長率為6.2%，比第一季減少0.2個百分點，創27年來的最低增速，景氣疲弱使得工業品供過於求，加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情況仍相當嚴重，第三季PPI增幅可能轉為負值，製造業有進一步放緩的跡象，因此下半年非食品商品大幅攀升的機率較低。

(三)降低匯率和貨幣政策的靈活性

即使整體物價上漲情況不算嚴重，但偏高的CPI會影響到大陸下半年的總體經濟政策，這主要表現在匯率和貨幣措施兩方面。一是限制人民幣貶值空間。在美中貿易戰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去年4月至今年6月已貶值約1成，緩和美國加徵關稅的衝擊，上半年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只減少8.1%，但同時也拉升進口水果及其他商品的價格，對物價上漲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因此，在上半年對全球出口仍微增0.1%的情況下，加上6月底G20「川習會」後美中雙方重新展開貿易談判，下半年人民幣應不會持續貶值，以免進一步帶動進口品價格上揚。

二是壓縮中國大陸降準規模。為提振內需因應美中貿易戰，今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調低存款準備率1個百分點，釋放近1.5兆元人民幣，部分增發的貨幣流入食品市場，助長了第二季鮮果和豬肉價格的大漲，因此5月公布的三階段「定向降準」只釋放2,800億元人民幣，並要求中小型銀行要把新增資金全部用於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貸款。為避免CPI升破3%的上限，下半年中國大陸降準的幅度和釋出的資金規模應該會有所節制，以避免對物價形成新的刺激效果。

表1：上半年中國大陸CPI和PPI同比漲幅

單位：%

月度	CPI 漲幅	PPI 漲幅
1月	1.7	0.1
2月	1.5	0.1
3月	2.3	0.4
4月	2.5	0.9
5月	2.7	0.6
6月	2.7	0.0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網站

三、香港反「逃犯條例」抗爭觀察

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主稿

-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議論，港民發起多次大型示威集會；抗爭主要原因包括中共不再重視港商經濟利益和投資環境、「一國兩制」立場改變及打壓港獨意識組織。
- 香港主權雖已移交，但民心並未回歸，修例事件引誘發香港年青族群積累已久的不滿與憤怒，除再次帶動移民潮外，民眾亦更堅定支持民主運動。

（一）事件背景

今年6月9日，香港103萬人上街抗議林鄭月娥政府引進「逃犯條例」的修訂案。香港人明顯感到憤怒。2014年8月底中共人大常委會就政制改革的決議拒絕民主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過去5年，他們感受到法治逐漸地受到侵蝕。「逃犯條例」修訂案容許香港人因在中國大陸或外地的罪行被引渡回中國大陸受審；香港人認為公平審訊是其基本政治權利，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司法制度沒有信心。除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以外，商界人士亦感到憂慮，因為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很容易牽涉入行賄、逃稅等事宜。

大遊行當天晚上，港府拒絕讓步並申明該條例的有關立法程序會如期推進，條例的內容亦不會改動。林鄭承認立法的建議並非來自中央政府，不過條例的修訂就清楚得到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過去數月，香港不少親中團體到北京訪問，得到韓正（負責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及以下的政府官員接見，鼓勵他們支持「逃犯條例」修訂。建制陣營原先有少數商界領袖、立法會議員及學者曾表示保留意見，至此亦轉為緘默。6月9日大規模遊行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翌日即宣佈有關議案討論的時間表，並定於6月20日進行投票。這種傲慢、不理民意的態度激起市民，特別是年青人的強烈反感。後者在6月12日立法會據時間表開始審議議案的早上，成功包圍立法會阻止其開會。其後下午出現與警方的衝突；其間警方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被批評為過

份使用暴力。絕大多數市民傾向同情年輕的示威者。示威的高峰期估計有四萬人參與，衝突中最少有 72 人受傷。

雖然林鄭月娥 15 日召開記者會，宣佈「逃犯條例」修訂暫緩；但 16 日仍有 2 百萬人上街要求撤回條例修訂。林鄭在記者會的傲慢態度無疑是一個因素。到 18 日，特首再開記者會，公開向全體市民道歉，表示預備到明年 7 月本立法會會期結束時，條例修訂案會自動作廢。但她拒絕下臺，亦拒絕民主運動的其他訴求，包括正式撤回議案，收回 6 月 12 日衝突「暴動」的定性，釋放被捕示威者以及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濫用暴力。

（二）整體評析

自上世紀 80 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以來，中方一直重視投資者的利益，因為他們明白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資金可以很容易撤走。但這次工商界和外資雖然公開反對，林鄭政府的稍微調整讓步沒法消弭其基本問題，就是對由中共領導的大陸司法制度缺乏信心。北京與特區政府認為應付他們眼中反對派和異見人士的挑戰，較保護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更為重要。

港人大多認為中共當局不斷收緊其對港政策，是造成這次危機的主因。首先中共領導層認為香港經濟非常依賴中國大陸；而近年中國大陸驕人的經濟成就，顯示香港對中現代化的貢獻已日漸走下坡。這種態度反映於香港親中陣營領袖和大陸訪港人士的言論。

其次是 2013 至 2014 年政改失敗導致「佔領運動」。中共領導人視香港為一個愛哭鬧的壞孩子，經常提出諸多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北京要教訓香港，讓香港人學會接受其訂定的「一國兩制」底線。

近年本土意識和極少數港獨組織的崛起，成為中國和香港政府政治鎮壓的藉口；在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打擊港獨的旗幟下，林鄭政府的鎮壓活動越趨嚴峻。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宣稱：有關國家安全問題，只有一國沒有兩制的責任。什麼時候北京一個部級官員可以有權重新界定「一國兩制」的範疇呢？

頻繁的拘捕和檢控具有一定的威懾作用。年青人入獄且留下犯罪

紀錄對日後工作有頗大的負面影響。面對政府的強硬態度，民主運動最大的挑戰是缺乏近期可以達到的目標。市民不再相信民主的訴求如民主普選特首、全面直選立法會所有議席可以得到實踐。社會的失望與悲觀意味著自「佔領運動」後很難動員市民，近年的示威遊行參與人數一般不多。

2018 年九龍東兩次補選民主陣營俱告失利，這兩個空缺是因為宣誓風波兩名激進民主派議員被褫奪議席而出現的。選舉失敗的主因是民主派只能動員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時 6 成的支持者出來在補選中投票，而建制陣營就能動員 8 成以上。代際的分歧以及激進派和溫和派之爭也是負面因素。雖然年青人政治參與的水平有所下降，但他們的不滿與憤怒仍在積聚。他們都是貧富懸殊、上向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房屋問題持續惡化等的主要受害者。這些憤怒會找尋機會爆發，例如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事實上，眾多年青人參與了今年 4 月 28 日、6 月 9 日和 6 月 16 日的三次大規模遊行，抗議修訂「逃犯條例」；三次遊行的參與人數分別為 13 萬、103 萬和 200 萬。

面對漸趨惡化的內外環境，習近平政府持續加強打壓政策，例如大學的「七不講」；打壓地下教會、獨立的勞工組織、人權律師等；迫害少數民族特別是新疆的維吾爾人，而其香港政策自然跟隨這一模式。當中共政權不斷以民族主義號召之際，打擊本土意識和港獨組織就成為重要政治任務。香港的民主運動經常也被抹黑為與外國勢力勾結。

香港是國際媒體搜集中國大陸信息的重要根據地，很多針對中國大陸及其領導層的批評亦源自香港。習近平政府的不安全感形成對香港上述特殊角色的負面印象。修訂「逃犯條例」和經常提到要進行 23 條立法反映這種加強阻嚇機制以打擊、操控反對派以及種種批評的意圖。不過商界的利益和香港的營商環境也受到打擊。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資訊自由流通和法治非常重要，這種認識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過去中共當局尊重投資者利益，銳意保護香港的營商環境，上述認識不成為問題，但今天不少人對此存疑。

上述分析，說明北京為了面子和管治權威，不願意清楚撤回「逃

犯條例」的修訂。中共領導層目前傾向支持林鄭政府，亦會動員建制陣營這樣做。不過林鄭月娥政府幾乎沒有正當性可言，香港人認為她一貫聽命北京，沒有維護香港人的利益。這正是批評她出賣香港的基本原因。她的民望現在低於前任梁振英；這在她上任之初是難以想像的。

極度弱勢的林鄭政府只有更為依賴中共領導層的支持，因為建制陣營對她相當不滿，據傳有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以粗言當面辱罵她。商界領袖認為她損害商界利益；民建聯、工聯會認為林鄭施政失敗會影響他們今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和明年 9 月立法會選舉的選情。對北京的依賴自然會帶來中共領導層更大的影響和更多的干預。香港人悲觀地認為一是移民，一是當順民，埋首噤聲賺錢。

（三）結語

中共領導人瞭解香港回歸，但人心未有回歸；對臺灣的示範作用幾乎全屬負面。香港的統戰幹部自可要求更多資源加強工作。在市民心中，民主運動是唯一的制衡力量；近期年青人的勇敢和犧牲精神予社會深刻印象。香港人明白沒有努力，沒有犧牲，就不能維護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利益。多數人都不能移民；能移民者也要付出相當代價。這是一個嚴峻考驗的年代，務實的香港人願意苦撐待變，未有放棄。

四、習近平出訪俄羅斯、中亞之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面對美中貿易戰依舊前途未卜，習近平強化密集出訪安排，不啻有尋求「突破口」之戰略設想，後續發展值得觀察。
- 儘管中俄關係持續升溫，在中亞事務方面也具一定協調度，但雙方地緣競爭仍存矛盾。

(一) 中俄雙邊關係之戰略意義

繼3月份對歐洲進行本年度初次出訪後，習近平在6月再度展開滿檔的出訪行程，首先是5-7日對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並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其次是12-16日出訪吉爾吉斯與塔吉克，並各別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以及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高峰會，接著是20-21日前往北韓，進行雙方一年半以來第五度會晤，最後則是27-29日前往日本大阪參加G20高峰會。總計在一個月內，由西向東橫互歐亞大陸，陸續造訪5個國家。

其中，俄羅斯既是第一站，也是重中之重。如同新華社所稱「搬不走的好鄰居，拆不散的真朋友」，略顯矯情的描述一般，自2013年以來，習近平在過去6年內造訪俄羅斯多達8次，與普丁會面更超過30次，在當前全球雙邊互動關係中確實罕見。2018年雙方貿易額首度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雖然與6,336億美元的中美貿易額相去甚遠，但在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的情況下，非僅不無小補，尤其在貿易戰拉抬全球油價之際，佔中俄貿易額半數的能源貿易價值乃愈顯重要。正因如此，此次習近平訪俄，既參與「能源商務論壇」，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創始於1997年，與2015年啟動的「東方經濟論壇」為俄羅斯主導之兩大經濟議題平臺)，同時簽署20項價值200億美元的合作方案，並提升雙方互動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互動不僅具雙邊象徵意義，在2018年5月簽署「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合作協定」並於今(2019)年生效後，

雙方既進一步推動建構「歐亞經濟夥伴關係」，一方面俄羅斯電信公司 MTS 允許華為公司在該國開發 5G 網絡，雙方在「關於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中指出「核武器國家應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停止毫無限制地發展全球反導系統，減少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既直接瞄準美國在年初片面退出「中程飛彈條約」之舉，亦暗示雙方在「對美」方面之共同利益。

（二）中國深化對中亞地區影響力

訪俄結束後不到一周，習近平馬不停蹄前往中亞。根據中共官方媒體的說法，此行被稱為「經略周邊的重大外交行動」，並將「元首外交、一帶一路與兩大峰會」列為三大觀察重點。首先值得關注的是上海合作組織與亞信會議的高峰會，前者每年召開，後者五年一次，但巧合的是，上一次（2018 年上合青島峰會與 2014 年亞信上海峰會）都在中國大陸舉辦。表面上看來，1999 年正式成立，擁有 27 個成員國、8 個觀察員國家和 5 個觀察員組織的亞信會議，在規模上大於 2001 年成立，目前有 8 個成員國、4 個觀察員國家和 6 個對話夥伴國的上合組織，但目標模糊且組織鬆散顯然是其缺陷所在，相對地，上合組織不但具有中俄「合意共管」之政策暗示，作為其核心之中亞地區的地緣戰略意義也不言可喻，尤其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在 2018 年正式加入運作後，其影響力上升更成為舉世矚目之焦點。

可以這麼說，無論推動「一帶一路」或應對美中貿易戰，透過上合組織來確認俄羅斯的「戰略協作性」或藉由該組織獲致必要之借力使力空間，都讓近幾年的上合峰會備受關注；據此，中國大陸雖在 2018 年憑藉自身主場優勢，在青島峰會中通過「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18-22 年實施綱要」，批准「打擊三股勢力未來 3 年合作綱要」、「成員國環保合作構想」，並制定「糧食安全合作綱要草案」等，2019 年峰會則暫無具體成果，尤其在 2014 年通過「政府間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後，最攸關落實帶路戰略之「政府間建立和運行交通運輸一體化系統協定」依舊缺乏共識。更甚者，不僅今（2019）年初，吉爾吉斯還爆發大規模反中示威，事實上此區域其他國家的反

中情緒亦持續醞釀中，這些不啻都為中國經略中亞埋下負面伏筆。

（三）不確定之歐亞周邊地緣環境

總的來說，習近平的俄羅斯與中亞之旅既有攻勢，也有守勢，前者指的是他利用既有平臺與地緣關係，透過合縱連橫試圖積極回應近期美中關係，形塑某種對己有利之同盟氛圍，後者則如同前述，嚴格來說，中俄並非「完美夥伴」或「天然盟友」，無論從勢力消長或地緣競爭（中亞原為莫斯科勢力範圍，遠東地區發展困境則始終是其軟肋）角度，矛盾既非不存在，北京方面在處理時亦勢必小心翼翼，以免碰觸俄羅斯敏感神經，特別是當上合組織往南亞延伸後，地緣複雜性更與日劇增。

至於其後續發展，則不啻可謂機會與挑戰並存。從正面來說，透過北京之積極布局，無論近期中俄關係乃至上合組織合作進一步制度化，均隱然使歐亞大陸形成某種龐大的陸權集團，足以制衡美國領銜之海權力量，從而可能影響下一階段全球權力結構變遷；但負面看來，則此一區域在歷史與地理上之糾葛，發展並非一朝一夕，解決當然也非容易之事，稍有不慎或出現意外，反成一個沉重的戰略包袱。

五、G20 峰會與美中互動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趙文志主稿

- 2019 年 G20 領袖高峰會關注美中貿易戰下的經濟風險問題，強調自由貿易的重要性，打造自由貿易體制的決心。
- 美中在各有所需下會面，川普同意暫不加徵額外關稅，習近平承諾購買美國大量農產品，但雙方結構性問題未解決，後續談判結果或有浮動式變化。

(一) 中美貿易戰下的 G20 領袖峰會宣言成果與觀察

2019 年 G20 領袖高峰會於 6 月 28 至 29 日於日本大阪召開，此次照慣例發佈的領袖宣言(G20 Osaka Leaders' Declaration)，共有 5 大面向 43 項的成果，主要包含幾大類別：全球經濟、貿易投資、產能過剩、創新：數位化與帶著信任的資料自由流通、高品質的基礎建設投資、全球金融、反貪污、勞工與就業、婦女賦權、旅遊、農業、發展、全球衛生、全球環境議題與挑戰、氣候變遷、能源、環境、遷徙與移民等。

從此次領袖宣言觀察，可以發現此次會議，G20 成員首先關注經濟問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閉幕的總結報告中，首先就提到：「占了世界 8 成經濟的 G20 國家們，必然要注意到世界經濟走下坡的危險並採取行動，在全球化的急速變化及不安中，會產生國與國之間的對立，以及自由貿易體制的對抗，但應該領導世界經濟，開創自由、公正、無差別的貿易市場，讓各國以公平的競爭條件、自由貿易的原則成長，這也在 G20 當中獲得一致共識。」

此外，面對人工智慧、數位創新等議題，如何建構新的規範與規則來因應新科技帶來的挑戰與環境變化，也是此次 G20 領袖峰會關注的面向。另外，環境議題也仍然持續受到關注，雖然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但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仍成為此次領袖峰會的結論，也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對全球氣候變遷努力所造成的打擊，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補。

此次領袖宣言當中有一項結論值得特別關注，就是關於基礎建設：要促進高品質的基礎建設投資。宣言中強調高品質基礎建設投資是 G20 努力方向，要最大化基礎建設與達到永續成長和發展的正面效應；同時要確保財政永續性與經濟效率，並整合環境與社會考量，對抗對環境災害與其他風險，強化基礎建設治理。很顯然是針對中國大陸近幾年來力推的帶路倡議所引發的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大力對外輸出基礎建設所導致債務陷阱、對環境及當地社會影響和衝擊的憂慮與質疑所做出的結論。

（二）G20 峰會下的 G2：川習會觀察

此次 G20 峰會特別引人關注的原因是在美中正陷入貿易僵局，川普在高峰會召開前又拋出如果習近平不去或拒絕與川普的會面，則美國將立即提高對中國大陸的關稅與制裁。也因此，此次大阪峰會下的 G2 如何互動與交手，格外引起外界注目。

習近平最終還是與川普會面，在雙邊會談之後，根據媒體報導，兩國達成恢復相關貿易協商；美國同意暫時不對中國大陸製產品額外加徵關稅；中國大陸將購買大量美國農產品；川普也同意美國企業在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繼續出售相關零組件產品給華為等共識。此次川習會我們可以有以下幾項觀察：

1. 美國是全球最大市場，亦是許多國家重要出口的終點，中國大陸亦不例外。雙方龐大貿易逆差，成為美方有利工具。此外，美國在高科技產業方面所掌握之關鍵技術，也對中國大陸企業發展至關重要。一旦美國採取一連串技術管制與相關禁令，將對中國大陸企業造成衝擊。也因此，習近平答應川普會面的要求。

2. 緩解但未終止的美中戰略競爭。雖然美中在此次 G20 川習會之後，貿易戰暫時休兵，但雙方結構性的競爭態勢並未終止。事實上，美中雙方衝突已經超越經貿面向，也包括科技、軍事、外交等領域。雙方雖然在川習會中同意暫時不再增加新關稅的課徵繼續談判，但並不意味著雙邊關係已經「輕舟已過萬重山」。相反的，這只是美中此回合較量的中場休息時間。雙方衝突已屬於結構性問題，兩國後續談

判結果以及相關中國大陸如何回應與落實談判結論，關係著此衝突未來發展走向。

3.雙方暫時都從此次會面中各取所需。對習近平來說，他並沒有拒絕川普的威脅，最終和川普見面，取得美國暫不加徵額外關稅、美國企業繼續供應相關零件設備給華為與休戰九十天的喘息機會；對川普而言，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展開，如何讓他的支持者（美國中西部農民），真實感受到川普執政帶來的好處，有其急迫性，威脅習近平要與其見面，取得中國大陸承諾購買「大量」美國農產品，正是實現競選承諾的重要成果。也因此，川普願意暫時休兵，進而可以向支持者展示其執政成績。雙方都在此次會面當中取得各自需要的時間與空間。中國大陸能否有效回應美國需求，後續談判結果或產生浮動式變化。

（三）結語

在川普認為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優先項目、不輕易妥協立場，與中國大陸此前發言抱持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奉陪」的態度，似乎兩國衝突難以避免。然而雙方是否就會像相向而行的火車，最終對撞，這就牽涉到雙方實力與意志力的較量，這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心裡意志等面向。目前中美之間正為了貿易逆差問題展開一系列的鬥爭與較勁即是其中一個面向，美國將中國大陸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之一，雙方勢必會持續維持目前的態勢很長一段時間，川習會只是這長期競爭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六、「習五條」後中共對臺工作動向觀察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主稿

- 在美中長期博弈競合關係、兩岸新型挑戰與臺灣內部朝野互動等因素影響下，兩岸關係充滿挑戰與變數；臺灣身處美中臺三方最小一方，須發揮智慧，務實面對兩岸情勢，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
- 歸納習近平歷次涉臺談話，中共對臺政策仍持續軟硬兩手策略，一面加大反獨，同時進行社會經濟融合的促融與透過民主協商的促統；靈活操作「單邊作為」、「區隔對待」、「地方包圍中央」對臺新策略。

(一)前言

今(2019)年不僅是 2020 年臺灣大選與美國大選前夕重要的關鍵年，也是五四運動 100 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70 周年，西藏抗暴日 (Tibetan Uprising Day) 60 周年，美、中建交 40 周年，美國訂定臺灣關係法 40 周年，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30 周年，澳門主權移交 20 周年，1999 年李前總統發表特殊兩國論 20 年，也是臺灣太陽花與香港雨傘運動 5 周年。日前香港更爆發史上抗議示威人數最多的反送中大遊行。

面對北京 2021 年建黨百年高舉第一個「中國夢」的到來；乃至 2022 年中共「二十大」的召開，習近平可望再度連任所賦予獨特的歷史使命(在對臺政策方面)。是以，不論臺灣 2020 年大選結果如何？未來臺灣的執政者都必須務實審慎面對外在美、中大國博弈，兩岸新型挑戰與臺灣內部朝野互動三大因素挑戰。凡此，都讓兩岸關係充滿著諸多挑戰與變數。因此，正確解讀中共對臺政策與未來兩岸關係可能變化，自有其必要性。

(二)美、中大國博弈下的中共對臺政策

綜觀 2019 年的美、中、臺三方互動關係，美、中可說是雙方自

1979 年建交 40 年以來關係處於低迷的年代。相較於美、中雙方在經貿議題與安全戰略的緊繃，美、臺關係的發展則是 40 年來取得大幅度的進展。一般認為，未來美、中關係至少在習近平提出現代化強國強軍的 2035 年前，美、中關係的矛盾與對立將多於和諧與合作，主要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已讓美國感受威脅日益加大。未來美、中總體關係仍然將是競爭、對抗與必要的合作兼具的時代。面對美、中關係的長期博弈競合自然也會對當前與今後的兩岸關係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美國目前已將中國大陸作為影響其領導全球經濟地位與競爭力的首要威脅，因此 2018 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突出，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模式感到不安。

未來可以判斷 2019 年以後的美、中貿易戰不限於貿易層面，將會環繞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科技崛起。針對中國大陸扶植其科技旗艦級企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警戒也超越貿易層面，並多以企業為標的。預期美國將加強對中國技術輸出管制，未來中國大陸要取得美國授權或收購美國企業將變得更加困難。美中貿易談判的核心未必在於美中貿易平衡，而在於形成新的國際制度規範，藉以改變中國大陸經濟體制。預期在新國際規範未出現前，美中兩強將持續對抗。臺灣與美國及中國大陸都擁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在美、中的大國互動博弈中，臺灣作為最小的一方，必須發揮最大的智慧，方足以確保臺灣的國家安全與利益。

根據個人觀察中共對臺政策，自從 2018 年臺灣九合一的選舉結果出爐，與 2020 年臺灣大選的考量，有其持續與變遷。在兩岸欠缺政治互信，民進黨政府無法從北京得到應有的善意回應。面對北京軟硬兩手都加大，「單邊作為」、「區隔對待」、「地方包圍中央」的對臺新策略，自然促使民進黨政府更加尋求美國等大國關係的強化。但在兩岸欠缺互信下，美、臺關係的強化，則必然引起北京更大的疑慮，或進一步對臺報復。北京加大對臺施壓，自然也促使臺灣對美國尋求更多的支持，這也讓兩岸關係面臨到更多的風險與挑戰。

(三) 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

長期以來對臺政策對於中共最高領導人而言，不僅涉及到執政基礎的正當性，有時更關乎到歷史地位的評價。因此，歷任最高領導人基於不同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不同的內外時空環境變遷、不同時期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實力對比，自然會提出不同的政策方針與策略方法。中共在「十八大」後選出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在 2013 年 3 月 14 日的「全國人大」會上，習近平也當選「國家主席」與「國家軍委主席」兩項職務，不僅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也正式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職負責對臺工作。根據個人觀察自從 2013 年到 2019 年 1 月 2 日「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紀念大會」發表「習五條」，與 2019 年 3 月 10 日「兩會」期間在福建省人大強調「融合發展」，習近平總共發表 25 次有關涉臺談話。

仔細檢視這 25 次重要講話可以歸納出習近平在對臺政策思維上的方針與走向：中共對臺政策除了一手加大反獨外，也一手加大社會經濟融合的促融與透過民主協商促統。一般認為習近平在對臺政策思想上，與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追求和平統一最大的不同在，習近平旨在推動「新一國兩制」。其特色乃將臺灣問題放到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略中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強化「單邊立法」與「單邊作為」，並同時加大「反獨」與「促統」力度。是以，習近平不僅強調以往鄧小平時代「一國兩制」下，會尊重臺灣地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如今更強調率先讓臺灣人民分享中國大陸發展機遇。強調擴大經濟文化交流，逐步為臺生、臺商、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就學、創業、就業、生活與中國大陸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目標，不僅強調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也號召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互動，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實現心靈契合，而不像當年鄧小平只單純追求形式統一。因此，在中共對臺政策上，相較於外交與國防上加大一中反獨的高壓底限思維，涉臺部門更是側重以耐心與恆心細膩來推動兩岸社會經濟文化融合與一中促談促統。未來中共涉臺部門更加大透過兩岸各政黨、團體與人士進行「一國兩制」目標下，有關「臺灣方案」探索的政治對話，

共議統一，以期促使「一中促統」也能早日水到渠成。

中共對臺政策的和緩與嚴峻有一部分也取決於美、中關係。習近平在「習五條」也強調，「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習的講法主要就是針對美國。一般認為，未來美、中關係至少在習近平提出強軍強國夢的 2035 年前，面對中國崛起與對美國威脅日益加大，未來美、中總體關係仍然將是對抗多於合作。面對外在美、中的可能變局，與中共對臺兩手抓(對民進黨政府硬與對臺灣民間軟)，我方也必須精準全面總體的評估，如何讓中華民國國家利益極大化與威脅極小化。事實上我國家利益評估與計算乃是對親美日等所獲取的利益的加總，扣除來自北京的侵蝕傷害，兩者加減所獲得的淨利益，換言之我方除了積極爭取美日所獲取的利益外，也必須精準評估北京可能對我國家利益所造成的傷害。

(四)結語

面對「習五條」後的中共對臺政策新戰略，可能對兩岸關係帶來諸多挑戰與變數，當前如何防範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在外在中、美大國博弈不確定因素與兩岸各自內部諸多因素(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高漲，與臺灣的民主選舉考量)變化制約下，兩岸雙方如何避免誤判與做好必要危機管控，乃為關心臺海和平有志之士亟需務實面對與思索的重要課題。面對 2020 年臺灣大選的可能結果，不論是蔡英文總統連任成功，或是國民黨乃至其他候選人當選，在中共高舉「習五條」作為新時期的對臺政策指導方針下，臺灣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也都必須面對不同的挑戰。

展望未來，面對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臺政策，一般認為當前臺灣在兩岸關係互動上，臺灣內部在政治自我認同日益強化，但在兩岸經貿實力對比卻是日益弱化。個人認為藍綠朝野對抗分裂的臺灣是不可能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因此，不論是面對中共的對臺政策日趨靈活多樣，抑或兩岸日後在重大議題的協商與談判，如何善用臺灣政党政

治、議會政治、媒體開放，乃至豐沛的公民社會活力，使其在兩岸互動中能成為有效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互動資產，而非在兩岸互動中成為腹背受敵的負債，殊值臺灣朝野省思。面對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臺新政策，臺灣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除了要精準解讀避免誤判外，也要積極加強立法、行政溝通與朝野對話外，更要加強與臺灣社會各界（學界、媒體、社團…等）溝通對話，同時也能善用臺灣政黨政治與多元社會做為雙層賽局，並在兩岸的政治經濟互動中爭取臺灣最大利益。畢竟一個藍綠分裂對抗的臺灣，不論是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浪潮，抑或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博弈，都難有前景與未來。兩岸的和平建構不僅端賴兩岸領導階層的互信，也繫乎兩岸人民的互信，更繫乎選後臺灣藍綠領袖的良性互動。畢竟一個欠缺政治互信的兩岸，與一個藍綠長期分裂對抗的臺灣，都難以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